

A stylized world map composed of a grid of dot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with several dots highlighted in red. The map is centered on the Atlantic Ocean.

社会增长

一种进步经济政策模型

2013年3月

- 本文所介绍的“社会增长”概念是一种进步经济政策模型，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FES) 提出，其目的是开发一个融全民富裕、可持续性和公正为一体的增长模型。该模型的主要对象是德国，但也计划在欧洲及全世界应用。
- 虽然本文建议的进步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社会的、由此是具有公平结构的生长，来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其间接目的是缓解德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和政治危机。
- 相比传统的市场驱动型增长模式，聚焦教育、保健、卫生和气候保护的社会增长对自然资源施加的压力更小。它还能实现人民期待从民主政治中获得的结果，也就是获得就业机会和分享这些就业机会所创造的富裕。
- 这样一来，社会增长就将赋予民主政体一种合法性。目前，这种合法性似乎丧失了，倒不是因为人民不信任民主政体的各种程序，而是因为缺乏能被社会接受的结果——换句话说，各国政府未能代表社会利益来治理市场。



目录

序言	1
摘要	1
一、 问题: 非均衡增长	2
二、 市场自由主义者和增长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	3
三、 "社会增长" 的概念	4
1. 工作、生产率与投资	5
2. 需求和分配	6
3. 国家和市场	6
4. 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	7
四、 "未来指南针": 一种进步经济政策	8
1. 克服债务危机	8
2. 一个社会德国的多种情形	9
3. 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	9
4. 各个相互依存经济体的民主治理	10
五、 一种进步经济政策的十点计划	11
1. 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规制, 保证信贷的稳定供给	11
2. 运用教育政策, 推动增长力量, 为所有人扩展机会	12
3. 运用产业政策, 开辟新增长领域	12
4. 通过最低工资和共决机制, 增强雇员地位	13
5. 改革税收政策, 适当而又公平地为公共任务提供资金	14
6. 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 稳定经济和债务状况	15
7. 建立稳健的公共金融架构, 增强欧洲的增长力	15
8. 协调经济政策, 为欧元区提供更多稳定性	16
9. 建立欧洲和全球标准, 保证所有人的体面劳动	17
10. 建立经济和货币新秩序, 管理全球化	17
六、 结束语	18
参考书目	19

序言

本文所介绍的“社会增长”概念是一种进步经济政策模型，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提出，其目的是开发一个融全民富裕、可持续性和公正为一体的增长模型。该模型的主要对象是德国，但也计划在欧洲及全世界应用。

虽然本文建议的进步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社会的、由此是具有公平结构的生长，来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其间接目的是缓解德国、欧洲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和政治危机。相比传统的市场驱动型增长模式，聚焦教育、保健、卫生和气候保护的社会增长对自然资源施加的压力更小。它还能实现人民期待从民主政治中获得的结果，也就是获得就业机会和分享这些就业机会所创造的富裕。这样一来，社会增长就将赋予民主政体一种合法性。目前，这种合法性似乎丧失了，倒不是因为人民不信任民主政体的各种程序，而是因为缺乏能被社会接受的成果——换句话说，各国政府未能代表社会利益来治理市场。

近年来，在艾伯特基金会内部或受其委托，部分是在“德国2020”项目（2007–2009年）、又有部分是在其后续的“社会增长”项目框架下，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和反思，为本文奠定了基础。文后的参考文献不但包括了上述研究成果，而且还反映了众多知名专家的贡献。在艾伯特基金会内部，在一个工作组框架里参与的人员有：René Bormann, Michael Dauderstädt, Philipp Fink, Sarah Ganter, Sergio Grassi, Björn Hacker, Marei John-Ohnesorg, Gero Maaß, Christoph Pohlmann, Markus Schreyer, Hubert Schillinger 和 Jochen Steinhilber。

摘要

此次经济和金融危机将主导增长模式的弱点暴露无遗。显然，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听任市场力量为所欲为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由于国家的总体回撤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德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了。金融市场全球化导致的日益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更是雪上加霜，促使金融资产和相关债务规模猛增。

从国际范围来看，这种发展状况表现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极大不平衡。目前，一些国家积累了高额经常账户顺差，而与此对应的是，另一些国家则出现了高额逆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顺差与逆差导致风险敞口大开，且外债累累，它们连同危机以来激增的公共债务一起，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因此，各

国急需减债策略，这一策略普遍包括扭转目前的资本流向。然而，调整的重担不能只让逆差国家来承担；顺差国家——尤其是德国——也必须参与其中。

简单地恢复危机前的做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要争取更平衡的社会增长，我们就必须告别“高效”金融市场的思想。本次危机表明，金融市场更多显现出的特征是羊群效应以及“情绪”的定期沉降。由金融市场独揽资本配置的大权已经造成了巨大失误。鉴于这些重大的市场失灵情况，国家必须对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并做出更加明显的社会政策和产业政策承诺。

本文提出的社会增长模型的目标是改变经济政策路线、提振国内需求。未来德国的增长有可能主要来自服务业，而非工业。我们有很多工作要补上，尤其是社会服务方面，如教育、保健和卫生等。因为购买力不足，许多需求、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宏观经济上可行的、结构上连贯而又公平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将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增长的服务业中去从事体面工作；这个模式能在总体上增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这个模式能够改善收入分配。

不平等是本次危机的肇因之一。为了减少不平等现象，必须更加有力地运用税收政策，如增加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重新开征财富税。为了缓解欧元区的失衡现象，各国应该协调其工资政策，更紧密地协调经济政策，包括对经常项目顺、逆差的监控。联合发行欧元债券可以成为欧元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甚至是财政一体化的开端。

欧洲范围内也好，全球范围内也好，社会增长必须指引市场，使市场效应沿着社会所希望的路径发展，这包括：工作条件方面的最低标准，保障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实施经协调的全球货币政策，使之能控制有害实体经济的大幅汇率波动。因此，实施该模式的进步经济政策必须基于以下十点计划：

1. 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规制，保证信贷的稳定供给；
2. 运用教育政策，推动增长力量，为所有人扩展机会；
3. 借助产业政策，开辟新增长领域；
4. 通过最低工资和共决机制，增强雇员地位；
5. 改革税收政策，适当而又公平地为公共任务提供资金；
6. 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和债务状况；
7. 建立稳健的公共金融架构，增强欧洲的增长力；
8. 协调经济政策，为欧元区提供更多稳定性；
9. 建立欧洲和全球标准，保证所有人的体面劳动；
10. 建立经济和货币新秩序，管理全球化。

一、问题: 非均衡增长

2007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刚刚显现出——至少是部分——被克服的迹象, 就又全力反扑。虽然一些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地恢复了危机前的高额金融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 但不幸的是, 其它国家仍深受危机之苦, 低增长, 高失业, 政府债台高筑。然而, 目前让人瞩目的政府债务, 很大程度上是对抗危机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依赖政府对银行实施的紧急救助和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 使得在最初迅速克服危机成为可能。如今, 金融市场危机已经转变为政府债务危机, 而后者又反过来可能激发新一轮的银行业危机。

本次经济危机揭示了现行经济增长模式有着根本性缺点。简单地恢复危机前的做法几乎不可能。为此, 各界对经济增长的利弊之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 各界也在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国家和市场失灵进行激辩。我们需要理解缺乏指引的增长过程所导致的错误, 以便能够制定出替代战略。“社会增长”模式就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我们需要描绘一种在社会方面平衡的并因此不易引发危机的增长模式。这包括要求政府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不仅在国内, 而且也在国际上, 在与其它国家合作的框架里以及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协调过程中。

本次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 其肇因是长期的全球增长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而后者又导致了金融资产爆炸。这些资产的缺点在于由累积的政府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所造成的高额债务。在许多国家, 如美国、英国、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 这一状况还伴有私人家庭的过度负债。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希腊——的政府为了为需求融资以拉动经济增长, 债务负担沉重。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缺乏监管、随意配置风险且无适当的透明度或控制, 使得债务和资产一直到危机爆发时迅速并行发展。

由此, 国际贸易中累积的巨大失衡无法通过市场或价格机制来平衡, 而是变得根深蒂固。在欧元区内部, 虽然增长稳健, 但近年来成员国之间的差异还是越来越大。欧洲中央银行 (ECB) 的单一货币政策鼓励了南欧高利率国家的债务驱动型非对称增长, 导致经常账户严重失衡, 最终在金融市场危机中垮下。

这种不平衡增长是由一些长期趋势催生的, 而这些长期趋势又反过来在过去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全球增长 (Dauderstädt 2011b):

- 全球化: 一方面, 自约1990年以来, 信息、资本、货物、服务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推动了增长。前共

产主义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进行了变革,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 这使得国际劳动分工和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成为可能, 并由此提高了生产率。全球因而更繁荣。另一方面, 这种纯粹市场和竞争导向的全球化过程迫使所有相关国家经历巨变, 以适应新环境。

- 不平等加剧: 收入增加了, 但收入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原因是, 各国为了竞相吸引企业、资产所有人和投资者而在税收收入、生产地、投资和就业机会方面开展的全球竞争, 削弱了国家、工会或工人的分配力量。实际上, 由于全球化成果分配极为不平等, 所有国家都出现资方利润占比的不断上升和工人工资占比的不断下降, 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 易发危机的金融市场: 全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也意味着目前金融部门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同实体经济隔离或脱钩。短期资本流动, 而且往往是投机性资本流动, 威胁着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因此, 最近几十年来, 全球经济越来越容易爆发危机。

初看之下, 德国经济——尤其是德国的出口经济——受益于上述动向。由于全球增长失衡, 国际市场对德国提供的众多产品——资本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强劲。德国使其生产流程国际化了, 其结果是, 相比其它国家, 它的工业部门强大且规模较大, 而服务部门规模较小。

然而, 细心考察可以发现, 德国有几个发展动态是成问题的。例如, 德国经济因为对出口业的依存度很高, 极易受到国外危机的影响。这不但影响到德国的银行业, 还会影响到德国的实体经济: 德国的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濒临灾难, 国家只得出手救助; 2009年, 德国经济负增长5%, 跻身国际最差行列。尽管失业率增加的幅度不大, 但这掩盖了工作时间的大幅减少, 原因是这种减少是发生在工作时间账户和短时工作。

从较长期来看, 德国的增长和就业活力从国际比较看也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主要依赖出口顺差而牺牲了内需, 德国经济在2005年前的增长相当疲软。此外, 从国际比较看, 低下且迅速下降的总生产率增幅也令人震惊 (van Ark et al. 2009)。德国的失业率已经在高位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甚至在危机前也如此。由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鼓励不稳定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德国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德国收入及财富不平等的增长快于几乎所有其它经合组织国家 (Bontrup 2010)。尤其是低技能者仍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 远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年里, 尝

到经济发展甜头的人就越来越少；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贫困的风险（尤其是老年贫困）增加了。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威胁到未来经济发展，还威胁到社会凝聚力。

近年来，德国政府也从许多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退出。这一方面反映在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变化上，危机前不久，政府开支跌至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点。其结果是，目前在公共部门，德国用于首次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比是最低的之一。这就抑制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削弱了未来增长的基础。

大幅减税之后，税率也锐减，导致单单过去十年间政府收入减少了约3500亿欧元，处于国际比较来看非常低的水平。减税旨在刺激私营企业的投资活动，但该目标并未实现，德国税收体系的再分配能力反遭削弱。资本和资产几乎不再需上税，这只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劳动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获得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实际承担的总税费负担越来越沉重。其结果是，承担大部分公共投资的政府，主要是州政府和市政府，缺少应对新出现的任务所需的财力。甚至于减少公共债务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即便在危机发生前，德国公共债务就已经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疲软和失业率高而增加，为应对当前危机所采取的财政救助政策使债务增速更快 (Priewe/Rietzler 2010)。

由于极强的出口导向，德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负增长5%）。最近，由于各国政府出台了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各国中央银行推行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全球经济有所好转。由于德国从中获益远超他国，因此，经济恢复得比其它国家快得多。劳动力市场的宽松导致名义工资温和上涨。不过，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回归出口导向型失衡模式。目前极低的实际利率——低名义利率和稍高的通胀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推动了增长。然而，同危机前的情况一样，“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奇迹”依赖于欧洲和全球需求。目前支撑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展中和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对经济过热、投机性资本流入和随时可能挤破的资产价格泡沫等威胁。无论是欧洲还是全球都面临重大的宏观经济风险和公共政策缺失，这就使得经济复苏的基础显得脆弱，并导致了复苏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公平。

如果不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成因，不充分调控和抑制经济危机的表象，经济危机可能愈演愈烈。不加指引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促使世界范围内的高风险发展：例如，过去的经济增长加快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推高了多种原材料的价格。由于家庭、企

业和国家等污染者可以搭那些发展经济者的顺风车，因此很难在气候保护方面采取全球集体行动。对原材料的争夺——在理想状态下——将导致原材料进口国之间对原材料出口国市场更激烈的竞争（这样它们才买得起原材料），也将导致各国之间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竞赛。但对原材料的争夺也可能引发自然资源的领土和经济控制权争端。

在过去，世界人口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现在，人口增长日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威胁。人口规模趋于稳定或收缩，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大大改变。劳动力供应将趋于减少，而老年人口的需求和预期将提高。这种人口结构状况改变所带来的痛苦，人们在德国要到2020年才能开始感受到，虽然它可能也将产生减少失业的积极的副作用。

二、市场自由主义者和增长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

目前，对主导增长模式的危机倾向的解读形形色色。一方面，有人倡导基于政治共识和尽可能民主合法化的法律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当是全球范围的，或者至少是多边的、泛欧的或全国性的。另一方面，也有人相信，在政府尽可能少干预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会解决国家、泛欧和全球的问题。债权国、资产持有人和大多数雇主之所以为这一选项进行呼吁，是因为这些解决方法倾向于反映它们的态度和利益。

贯穿这一格局的是倡导全球化、欧洲化和增长的人士同公开放弃全球化、欧洲化和增长的人士之间的鸿沟。后者希望抑制全球化，以支持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商品和金融流通，并放弃增长；前者虽然可能希望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全球化、欧洲化和增长过程，但它们欢迎这些发展态势。那些放弃增长者持右翼激进或左翼激进立场。前者寻求在破解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拯救，支持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商品和金融流通，主张回归民粹民族主义政治；后者则梦想在单个国家内部建设不受世界市场和增长左右的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还要求收缩增长（“退行增长”），以便考虑到环境制约，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能继续增长。

在德国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激进立场迄今为止扮演的角色相对次要，几乎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尽管公共辩论中经常有对增长和全球化的批评和欧洲怀疑论，但选择退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

为什么要增长？

保守派 (Miegel 2010)、绿色派 (Seidl/Zahrnt 2010) 和左翼 (Passadakís/Schmelzer 2011) 的增长批评人士从根本上质疑进一步增长的合理性。进一步增长对环境而言不可持续, 满足的不再是 "真正的" 需求, 不会让人民幸福, 而且是建立在对自然和人民、尤其是对较贫穷国家的自然和人民的剥削之上。有些人认为, 之所以要有这种强迫性的进一步增长, 是为了向当前设立的社保体系提供资金, 也有些人认为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商业利益。

这种批评站不住脚。增长很重要, 以便满足至今尚未得到满足的重大社会需求。增长还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部门或领域也是有意义的, 如教育、卫生和气候保护。经济增长不需要消耗更多的原材料和能源。例如, 将家庭活动转变为市场雇佣行为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 我们不必全盘摒弃增长。增长其实要回答的问题是, 还应提供哪些实际商品和服务, 以及谁的收入应该增长。社会希望享有更多的教育、卫生、保健和可再生能源。世界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乃至德国贫穷人口的收入应当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提升。

然而, 增长绝对不是万灵药。例如, 尽管增长的坚定倡导者急切地指出, 没有增长就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但他们的说法不可全信。首先, 虽说不依赖增长来实现充分就业在政治上难度更大, 但还是可以通过必要工作和收入的再分配来做到。其次, 历史经验表明, 增长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和更公平的收入再分配。为了实现或维持充分就业, 增长率必须高于总生产率增幅带来的就业阈值。可是, 正如过去已经经常有的情况, 生产率的提升也可以转化成更多的空闲时间。而空闲时间的分配必须确保不让一大批雇员长期失业, 而是让所有人的每周工作时间缩短、有更多假期或更早退休。

最后, 如果还有重大需求未被满足, 不管是低收入贫穷人口的需求还是在购买力低但需求可观的领域, 增长仍然是有意义的 (Dauderstädt 2010a)。与之相反, 难以促进社会繁荣的奢侈品不应该再有增长。

个严肃的政治观点。然而, 在基本上倡导增长、相信增长必要性的人之间, 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 例如, 他们对在何种程度上愿意寻求超国家解决方案、承担全球和欧洲责任以及实践团结性的看法并不统一。

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全球化的民主和社会管理/治理;
- 经济政策中的供应导向和需求导向之间的关系;
- 国家间合作及竞争的重要性;
- 运用国际上一致通过的标准和法规来防范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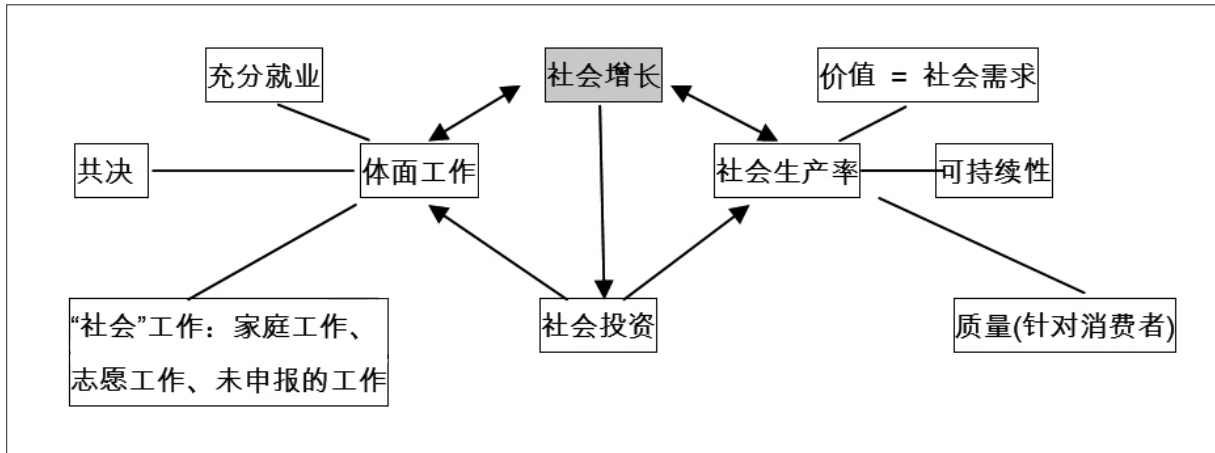
德国经济政策辩论由两大传统阵营主导: 一个更为强调市场力量、私人能动性和 "个人责任"; 另一个则希望通过政府干预乃至抵制市场, 建立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甚至生态关系。政府的治理角色不在争议范围内。第一个阵营依赖供应方力量, 而供应方力量会受到政府过分监管、税收过高和强大工会的阻碍; 另一个阵营则视上述这一切为纠正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前者认为不平等是增长的自然伴生现象, 因而可以接受; 后者则认为不平等是市场力量导致的, 因此, 为了获得长期增长, 必须实现平等。

三、"社会增长" 的概念

"社会增长" 这一概念旨在确定一个范式, 它为目前基于市场驱动型增长的主导话语和当下流行的增长怀疑论提供了一个替代话语。"社会增长" 旨在重新界定 "工作"、"价值创造"、"生产率"、"投资" 和 "债务" 等关键概念, 翻开经济政策的新篇章。"社会增长" 的主要认识是, 各类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证实无法进行理性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社会需求与不公平分配的购买力大相径庭。这一学说将表达为具体的经济政策建议; 如果将这些建议纳入 "社会增长" 范式, 那么它们就会具有更强的正当性和连贯性。

"社会增长" 意在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体面工作和共享社会繁荣的机会。毫无疑问, 人们只能分配产出的东西——但人人都该分配到应得的一份。就业增加和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分配空间, 不但应该用于增加私人及公共消费和投资, 而且应该创造更多的空闲时间, 也即更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更多的假期和更长的老有所养期。为了增加就业和提升生产率, 需要对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有形和无形资本存量进行投资。这些社会投资必须得到促进和疏导, 必须从金融市场这个大赌场中解放出来 (Dauderstädt 2010d)。

图 1: 社会增长的供应端



1. 工作、生产率与投资

在供给方面, 经济增长来自更多的工作和/或更高的生产率 (参见图1)。而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生产率主要由投资增加来推动; 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或者, 投资借助现代化的资本存量, 让劳动力的生产率更高。然而, 工作、生产率和投资这三个关键的增长因素必须进行更为精确的定义, 否则称不上是“良好的”或“社会的”。

- 体面工作是指, 向劳动者支付适当报酬, 使其能够照顾好自己 and 家人的工作。体面工作还让工人在其工作场所有发言权。充分就业能最优地满足这些条件, 因为充分就业赋予雇佣劳动者强大的市场力量。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取代未申报的 (“地下”) 工作、家庭工作或志愿工作的新增就业只有在生产率更高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新繁荣。
- 社会生产率有别于传统上理解并衡量的生产率, 因为它计入了 (负面的) 外部效应, 排除了以员工利益为代价的效率提升。产品——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的价值表达了社会需求。从消费者角度看到的质量改善也是价值创造。如果生产率在表面上的提高完全来自更高的产出或更低的投入价格、工作强化 (也即同样工作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隐蔽的质量滑坡或不平等收入分配导致的精英需求结构导向, 那么它并没有增加社会总财富。
- 社会投资是指通过创造就业或提高生产率以促进增长而产生的支出。不同金融投资载体间的资产重组不是社会投资。传统上, 私人创业者会投资打造更好的资本存量, 从而创造新的或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岗位。除此之外, 政府在实体 (也即基础设施)

和教育、研究和保健上的开支也是社会投资。私人家庭在住房、教育等上的花费从长远来看也能促进繁荣。

在私营经济中, 投资者之所以投资, 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会有收益流, 由此证明经常由贷款融资的支出是正当的。企业期望市场上会有对其产品的需求; 政府期望税收收入会更高; 家庭期望收入增加和/或成本降低 (如房租成本)。这些收入只有在其它行为体承担相关支出情况下才会发生。为此, 他们都需要获得收入或信贷 (见第三章第2节)。

一方面, 并非所有私营经济投资本身都有利于社会增长。另一方面, 私营经济系统化地忽视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这种市场失灵提出了在未来究竟什么应该增长的问题。虽然工业部门会在德国经济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工业部门的增长就会在长期里增加就业。事实上,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占比已经持续下滑了几十年。不过在德国, 下滑的势头比较缓慢。相比之下, 服务行业的就业占比有所提高。服务行业, 尤其是社会服务行业, 还有很大的就业潜力。

扩大服务, 尤其是扩大教育、卫生和保健等领域的服务, 也将是社会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样, 这样的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又有赖于生产率的提高。目前, 新增的岗位吸收了部分失业人员或迫不得已从事兼职工作的人员, 也有一些家庭内部的服务转化为市场服务。这就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 尽管只有在市场导向型的工作更专业化、生产率更高、质量更好的情况下, 社会繁荣才能增加。长期以来, 人们担心服务生产率无法真正提高 (被称为 “鲍莫尔成本病”), 但这一论点忽略了诸如质量和无形资产等重要的生产率要素。

2. 需求和分配

社会增长——像所有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过程一样——需要充足的总需求增加。社会需求受到总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新增贷款等的制约（见图2）。只有当收入被直接消费，或者通过政府——税收和缴费——或金融部门转移给消费这些收入的人，那么收入就会对需求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府转移的那部分资金会被花掉，因为无论转移支付的接收对象还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几乎不储蓄。至于那些提供给金融部门的储蓄，问题就复杂多了，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流入投资工具，这些投资工具几乎刺激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至少无法直接起效。然而，金融部门——特别是在中央银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也能放出大于其它行为体（主要是家庭，也有企业，很少有政府）储蓄额的贷款。只有这些超出储蓄额的贷款才会促进增长。

事实上，增长要求，各个部门或行为体愿意举债，从而吸收其它行为体或部门的储蓄。如果没有举债的意愿，增长就会慢慢停止，否则增加的供应找不到充足的需求，只好降价。而举债的意愿度又取决于利率。利率必须低于预期回报率。然而，至于整体经济，发债行必须选择适当的利率，以便总体借贷和相应的需求不会超过实际供应机会太多，以及不会只是引发通货膨胀。过去，从德国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德国联邦银行还是欧洲中央银行都倾向于采取过于限制性行为，以至于需求降到潜在供应水平之下，并因而导致了失业和疲软增长。

因此，短期来说，借贷可以弥补低工资导致的需求不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然而，美国经验显示，不断攀升的债务无法持久替代过低的、分配不平等的收入。只有高收入，才会有高储蓄率。过去20年间，德国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富有阶层的收入增速远远高于较贫困人群。这不但抑制了需求，还催生了一个越来越向富裕家庭倾斜的需求结构（奢侈品和地位象征品）。富裕家庭税赋的减轻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还限制了政府满足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的能力。因此，在将来，必须确保价值创造的新增部分也让员工共享。只有这样，疲软的需求才不会阻碍增长。

3. 国家和市场

首先，无论社会需求是通过公共方式、集体方式还是经由市场的私人方式来满足的，供应和需求间的收入循环都在运行。常有人说，税赋和缴费会降低需

求。如上文所述，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事实正好相反。如果政府承担了私营部门没有承担的支出，那么需求和供应都会增加，旋即带来新增就业机会和增长。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担心，相比市场和私营企业，政府作为供应商的效率会低一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通过私有化来期待获得更多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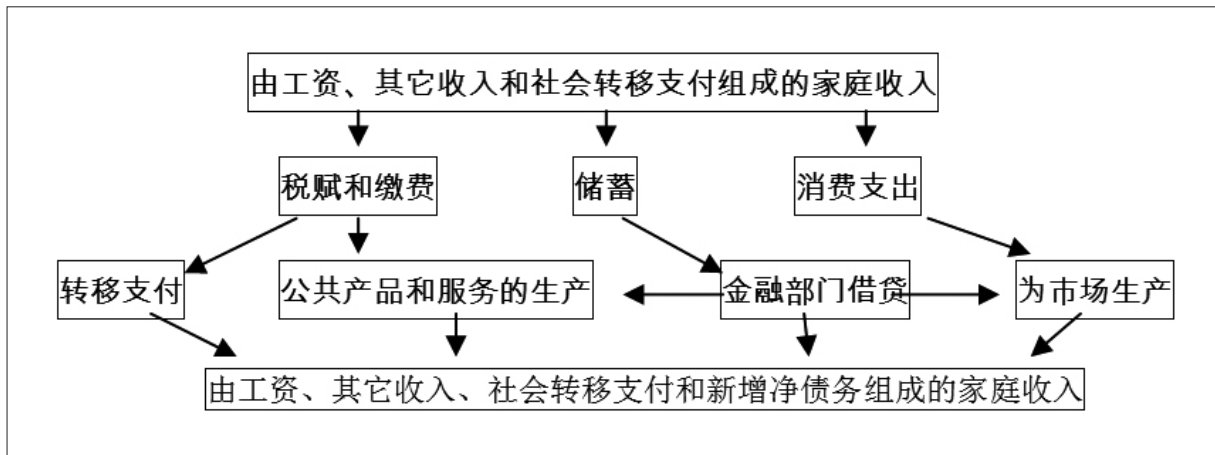
市场可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能更好地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供需关系。理想状态下，价格应该反映社会偏好，指导生产要素流入那些满足社会偏好的供应活动。然而，现实更多的是不一样的：

- 人和人之间收入及财富大相径庭，由此购买力的分配不平等。这就扭曲了价格和社会偏好及需求之间的关系。
- 价格机制没有计入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和公共产品方面的利益及失灵（例如公共安全、金融市场稳定等）。
- 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获得的利益小得多。例如，一位消费者买了一件产品，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做了贡献，可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个产品给他带来的好处很少（甚至没有好处）。
- 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理应反映预期回报率，但其实——同长期以来流行的效率市场假设相悖——资本市场效率不但不高，反而往往出现羊群效应。由此，资本市场就把投资引向某些行业——如美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的住宅建筑业，这些行业里的社会需求最终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综合上述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失灵的原因，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必要的，某些社会需求必须由国家来满足。但是，如果私营企业代替国家来满足供应的话，效率可能会提高。不过，不要把效率、生产率和成本削减混为一谈。成本削减可以来自工资或其它投入要素价格的下行压力，而这就意味着财富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

常有人说，国家应该不插手经济结构变化，而要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但仔细想来，这一经常表达的要求其实站不住脚。国家一直在执行产业政策，有的公开地直接支持个别部门或行业，有的提供秘密支持，秘密支持的形式有：通过国家的教育与培训体制来促进国际竞争力，或甚至采用经济刺激措施，如为了帮助建筑业和制造业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向工作时间缩短的工人提供补偿，这样就防止了产能、知识和增长潜力的流失。

图 2: 收入循环



此外, 历史上多个例子证明, 市场不一定总比政府更擅长成功而又持久地开辟新增长领域 (微处理器, 因特网, 可再生能源)。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也表明, 放任市场力量指导投资不一定总是对社会有好处。因此, 国家应该在可持续产业和结构政策框架下, 努力引导投资和资本流向前瞻性和进步性的、为社会带来最大利益的用途。与此同时, 政府不应该阻止无法避免的结构变革, 而应该用社会政策来支持必要的环境、经济和社会调整过程。未来的生产和消费的组织方式必须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气候和环境保护,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4. 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

在跨国市场上, 收入循环 (见图2) 是跨国界的。如果私人行为体或个别国家出现失衡, 超国家组织不再有能力对其进行规制并重归平衡。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相差悬殊, 全球——或者欧洲——的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会抑制许多国家的工资上涨, 使得工资同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脱节。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然而, 中国等国迎头赶上, 为降低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做出了一点贡献。然而, 这些国家由此产生的储蓄增长却又刺激了资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为了实现全球和欧洲层面的社会增长, 除了通过投资实体经济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以外, 还要求充分就业。必须通过更好的分配, 特别是通过基于生产率的工资制度, 来保证需求。

- 这意味着, 在全球层面, 各国、尤其是贫穷国家必须降低失业率、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基于出口顺差和低工资的追赶战略必须用面向内需和减

资的战略来平衡。对必要投资的融资不应完全放手给监管不善的、易受羊群效应及各参与行为体躁狂和恐慌影响的全球资本市场。

- 欧洲内部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平等。虽然多数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近年来有所加剧, 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还是主要体现在各国之间显著的收入差异上。近期的区域追赶降低了国家间的不平等, 却因债务危机戛然而止, 它应当在欧洲增长战略框架下加以恢复。同样, 欧盟内部必要的投资也不能完全放手给市场。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房地产投资过多, 而且过于轻率, 这是一次糟糕的投资, 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单一市场内的体面工作必须通过制定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和薪酬等方面高的最低水准来保障。欧洲内部的供求应由一种经过协调的经济政策来管理, 这种政策应能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高增长和高就业并限制失衡。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一个国家的货币——目前为美元——被当做全球流通货币和主要的储备货币。为了向全球经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必须保持逆差。然而, 世界经济和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对主要储备货币的稳定性的信心。逆差动摇这种信心, 从美元实际价值的屡次动荡中可见一斑。所幸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仍居世界之首, 加之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取而代之, 这一信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丧失殆尽。

由于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储备多以美元形式存在, 美国得以奉行扩张型的国内政策, 导致了不可持续的高资产价格和消费景气。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加上美国的扩张型货币和财

政政策造成了“对称失调”：只要顺差国家愿意以美元形持有其储备，顺逆差国家均不会面临调整压力。主要储备货币国（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向国内经济目标倾斜，因此或多或少地接受其对全球流动性的负面影响（体现为供应过度或短缺）。在金融市场放松规制的大潮中，具有如此结构的世界货币体系交替出现“繁荣与萧条”，换句话说，导致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然后周期性挤破。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全球失衡、将世界经济恢复到某种均衡状态，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会爆发，损害全球增长，并因而损害所有国家的繁荣。

四、“未来指南针”： 一种进步经济政策

一种新的社会增长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实施新社会增长模式的经济政策工具有哪些？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克服债务危机，这就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结构性的再监管。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促进又能保障更多社会平衡及环境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既然无法期望市场力量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就算有一个独创的经济政策来调配这些力量也无济于事——成功比以往更依赖于政府政策。如今，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高效力的超国家经济政策要求各国政府紧密合作，建立监管和治理结构。

1. 克服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和——一部分由收入不平等导致的——国家间宏观经济失衡日渐严重（Busch 2009）。之前，各行业及（逆差）国家寄希望于长期增长，因此愿意借钱消费和投资，于是推动了增长，顺差国家从中受益。如果没有这种债务的累积，增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早就该崩溃了。金融体系一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了长期的债务驱动型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转移和伪装风险延伸了不可持续增长的路径。更糟糕的是，对风险的认知在虚假的乐观主义和纯粹恐慌之间极度波动，从而引发深重危机，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

在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强力干预后，金融市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才受到了限制和缓解。其结果是，资产价值以负债方的重组为代价得以大幅回升，而国家不得不承担更大比例的债务和风险（Dullien/von Hardenberg 2011; Dullien 2010a; McKinsey 2011）。为了扫清障碍，实现新的可持续增长，大幅度减债不可避免。减债途径有三种（可组合运用）（Dauderstädt 2009b）：

- (1) 债务（和财富）的“折减”。私人债务早已折减（如美国的抵押贷款）。主权债务的豁免不大行得通。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豁免主权债务，那么银行很可能被波及，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或接受纾困。这样一来，债务并没有折减，只是债务人换了：国家只得接手这些债务（作为某种“最后债务人”）。
- (2) 债权人过度支出，给债务人带来剩余收入。为此，顺差国家必须乐意接受经常账户赤字；资产持有人必须投资和/或大量消费，或者缴更多的税（财富税、财产税、遗产税）。
- (3) 连续几年通胀大幅走高，但仍在控制之下——每年约4–6%——以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各国中央银行将坐视价格上涨而不提高利率。特别要指出的是，领取固定收入——养老金、社会福利、低工资——的较贫困人口必须受到保护，如根据通胀率调高收入和/或财政救济，否则他们的生活水平 and 购买力会下降。

要走出危机，必须三管齐下。然而，从进步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第二种途径将占据主导地位。它对穷人造成的分配风险较低，还能减少增长失衡。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必须加以监管，避免再次出现资产泡沫。这并不意味着对实体经济借贷进行不合理的限制，而是削减投机、提高透明度并明确分配风险和责任。为此，必须取消所有影子银行，清理大量非标准金融产品，引入金融交易税，让金融行业回归稳健的、“乏味的”商业模式，包括采用恰当的薪酬结构（为实体经济、到期票据和风险转移提供融资）（Kampeter 2011; Kapoor 2010; Dullien/Herr/Kellermann 2009, 2011）。

2. 一个社会德国的多种情形

在德国，基于抑制工资增长和政府退出的增长模式必须加以纠正。这一模式已经导致了社会分化和过度依赖出口的脆弱增长（Bontrup 2010）。国内需求，尤其是有重大社会需求的领域——如可再生能源、教育、卫生和保健——必须通过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融资更稳健的公共消费来加强。这些领域还能新增就业机会和收入。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三项主要研究设想刺激了德国社会增长的若干情形：

- (1) 在“未来2020”项目框架下的第一项研究，是Bartsch计量经济学研究所在2008–2009年间完成的（Bartsch et al. 2009a; Bartsch et al. 2009b）。该

研究假设了公共投资的增加,特别是培训教育领域公共投资的增加,以及生产率导向型工资政策。相比经济政策不变的基线情形,该情形导致更高增长、更低失业率、更好的分配和更低的公共债务 (Bormann et al. 2009a; Bormann et al. 2009b)。

- (2) 在Prognos (2010/2012) 进行的第二项研究中,通过扩大社会服务来促增长。据该研究测算,如果创造100万个左右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卫生领域的岗位,那么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220亿欧元(约为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中三分之二由国家实现(税赋和社保缴费大致各占一半),三分之一由市场实现。家庭新增(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个人消费,另外三分之二来自公共服务开支 (Prognos 2011b)。
- (3) 在题为“健康市场发展与经济和就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的第三项研究(2011)中,莱因-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探讨了健康行业强劲扩张——每年2%——带来的增长和就业影响。该研究假设每年实际生产率提高1%,而健康部门的年生产率增幅只有一半,也即每年0.5%。那么,到2030年,德国经济中健康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将从10%上升到13%,就业比重将从12%上升到16%。相应地,健康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也会提高,而贫困家庭健康支出的增幅(从16%到24%)比富裕家庭的健康支出的增幅(从6%到10%)更大。社保缴费也会骤升。不过,其它领域的绝对支出不会因此而收缩,社会福利也会增加 (RWI 2011)。

这样一来,德国就有能力走上一条不同的增长之路,可以在不增加家庭债务及国家预算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转型和社会服务的扩充。德国的高额出口顺差揭示,国内消费和投资还大有潜力可挖。即使没有上述利好,德国也无需担心繁荣程度会下降。虽然德国需要改变消费和生产结构,但转型可以在增长环境下实现,也就是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无需被迫削减传统消费。为此,我们必须保证购买力的稳定,以满足新的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对资产增长加以限制 (Dauderstädt 2011a; Pfaller 2010b)。

3. 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

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道路是欧洲及全球经济失衡的肇因之一,这被证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Artus 2010; Dauderstädt/Hillebrand 2009; Dullien 2010b; Münchau 2010)。上文所述的社会增长将有助

于缓解经济状况。不过,除了德国,还有几个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及一些石油出口国——存在很大的出口顺差。顺差的缺点在于会引发大量资本出口,导致资本流入国泡沫式“繁荣”增长 (Priewe 2011)。通常,多种工资趋势会伴随这些失衡应运而生,也即许多顺差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实际工资滞涨、单位工资成本低,而许多逆差国家(如欧洲外围国家)的单位工资成本剧增 (Dauderstädt 2009a; Busch 2009)。

危机爆发前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欧洲及世界各国之间依然巨大的收入差别 (Dauderstädt 2010c; 2011c),虽然乍看之下,也导致了资本从穷国(中国)到富国(美国)的不正常流动。因此,较贫穷国家更有必要将追赶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从资本市场的动荡影响下解脱出来。穷国的资本存量——包括企业资本、基础设施和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扩张所需的资金必须是长期的、不受投机影响的。这样,即便某些部门和地方必须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一个国家内或全球范围生产率的提升也能惠及全社会 (Dauderstädt 2010b)。

但是,增长的可持续性不仅受到增长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的威胁,还受到它强加给全球资源的巨大张力的威胁。原材料价格的走高表明,意愿消费高于当前供应,对于许多原材料而言高于其长期供应。价格机制会保证长期供应增加,而需求由于节约和替代会相对减少。可是,价格上涨给穷人造成的负担特别大,而更为集约的矿物资源开采常常带来社会成本的剧增及环境污染,这些是即使价格上涨也往往无法充分反映的。

尽管在传统增长模式下,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生命的自然基础,尤其是气候 (Netzer 2011),但解决方案不能是简单地放弃增长,或者“退行增长”。还有太多人饱暖不济,缺乏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因此,社会增长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选择应用:较贫穷人口的收入应该上升得更快;旨在中期节约资源的投资应该增加;社会服务应该发展,因为它们满足社会需求,而且一般不会太密集地占用资源 (Spangenberg/Lorek 2003)。

4. 各个相互依存经济体的民主治理

如上文所述,全球风险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各国的发展路径的成功应通过合作性全球经济和结构政策来保障。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化话语主张经济去政治化,怀疑国家的作用,而且全球过程反对“摩洛克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未来数年,政治应当取代经济的首要位置。然而,在该框架下寻求新政策空间时应着眼于务实的解决方案,既超越国家主

义,又超越对国家的敌意。这样就有可能进行关于现代国家设想的政治辩论——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辩论 (Steinhilber 2008)。

在未来,即使德国不再过度依赖出口,它还是需要倚重运作正常的全球经济。德国的繁荣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包括国际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监管的要素能否适应新形势。因此,制定一个以合作和一体化为目标的切实可行的外部经济政策将是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考虑到德国在全球经济大国中间的声音相对弱小,这一任务只有在强大的欧盟框架下才能得到有效执行。

事实上,此次危机和对抗危机的努力表明,在欧洲,经济政策已经不受国界局限。鉴于未来欧洲面临的共同挑战——如市场的进一步全球化、气候变化、日渐稀缺的资源 and 人口结构变化——更是如此。多年前建立的单一市场和货币联盟形成了欧盟内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共同责任和管辖权。然而,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揭示了欧洲失衡的一体化进程中的许多缺陷、弱点和一边倒情况 (Busch / Hirschel 2011; Hacker 2011a)。欧盟的中心项目——建立单一市场和经济与货币联盟 (EMU) ——的确为各成员国带来了繁荣,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导致的负面影响也在欧洲特别突出。实现一体化的主要途径除了企业间的“市场创造”过程,还有国家间的“市场创造”过程:消除贸易壁垒,通过降低工资、社保缴费和税赋等强化竞争,以及打造“市场友好”的区位优势。与此相反,“市场塑造”和“市场纠正”过程——包括共同就业保护标准和社会标准、欧盟政策管辖权的制度性组织和进一步发展等——继续坚持 (Höpner/Schäfer 2010) “宪法最小主义”(Platzer 2009)。

然而,问题和困难——包括欧元的崩溃和最终欧洲及欧洲观念的崩溃——的避免,只能通过强化市场纠正和市场塑造政策工具,且最终通过政治联盟意义里的“更多欧洲”(Arbeitskreis Europa 2010b)来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将欧盟转变成一个政治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民主参与权利,就像在各成员国内部那样得到保障。不过,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政府间经济决策集中到布鲁塞尔。这种集中决策只有当它是在民主控制下进行的,才是正当的(例如,在共同体方法框架下)(Collignon 2010)。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只能加强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共同协调和协商一致。但这也意味着,欧盟或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制度上共同享有在之前由成员国各自负责的政策领域的发言权 (Heise/Heise 2010)。这就要求将更深入的一体化措施摆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更多

欧洲”的名义强化竞争原则、限制政策制定空间,只会使欧洲项目从内部崩溃。因此,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欧洲经济治理新范式,这个范式将恢复欧盟内部的经济平衡和促进社会进步作为主要任务 (Hacker / van Treeck 2010)。

尽管近年来社会保障政策在全球发展困境的阴影笼罩下黯然失色,但如今,社会增长这一议题强势回归议程中,包括全球议程。这一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构造。发展问题不再是南方国家独有的问题,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区出现了同南方国家一样的贫穷现象,从而导致了危机,而危机可能波及目前仍然富裕的北方中心地带。北方中心地带的发展模式又在环境危机的打击下每况日下。一些国家的追赶战略又会加剧环境危机。因此,为了实现全球层面的社会增长并最终实现全球发展,我们只能寻求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在该模式下,每个国家会不但从环保的角度对经济进行重组,而且会实行更为公平的分配 (Netzer 2011)。在全球层面上,这意味着,较不发达国家应得到帮助,以便开辟出兼顾下述四大因素的新增长路径:

- (1) 强调二氧化碳减排的环保型增长;
- (2) 创造就业机会的社会可持续增长;
- (3) 不再听任资本市场波动摆布的可持续增长;
- (4) 通过区域一体化和加强区域基础设施来实现区域增长。

为此,必须解决(有关银行界的)监管危机和(有关全球失衡的)全球经济治理危机。

然而,全球层面的决策结构——尤其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一直面临着合法性和接受度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些组织至今还由传统的工业化国家所主导,也因此主要代表它们的利益。这些组织反映的是它们在二战结束组建初期的大国之间的经济和力量平衡,而不是如今的全球力量平衡。因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不具代表性,也不民主。不过,现在也有一些非正式却影响力很强的治理论坛,例如,先前的七国/八国集团现在已经扩展成了20国集团,扩大并接纳了一些主要的新兴国家。但这些论坛也有合法性问题,没有参与的国家不愿意支持它们。

要应对正在出现的未来重大全球挑战,发达国家就必须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后者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和贸易结构中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 (Joerißen / Steinhilber 2008)。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多边主义体制现在已经结构老化,不堪重负,因此,

需要改革。而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必须以平等地位加入新机制。虽然20国集团开了一个好头，让如今的主要经济大国平等地出席论坛 (Pohlmann / Reichert / Schillinger 2010)，但这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谨小慎微的改革，还不足以实现积极整合。国际共同体至今才刚刚开始考虑建立高效的、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结构。这样的结构能在互信的基础上减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拓展新的发展领域。

五、一种进步经济政策的十点计划

以下十点计划概括介绍了对实现“社会增长”而言必要的或有利的改革。

1. 通过有效的金融市场规制，保证信贷的稳定供给

社会增长就跟其它任何形式的增长一样，取决于充分的信贷供给。因此，我们必须确保金融市场——该市场目光短浅，时不时地对风险和无限制贷款胃口大开，从众倾向就更别提了——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于灾难性危机之中。金融市场已经跨国整合，银行既有来自外国债权人的负债（存款），也有来自外国债务人的资产（投资）。纯粹国家层面上的存款人保护、流动性支持（最后贷款人）资产估值（影响到法定最低准备金等）越来越不可行。有的小国——冰岛、爱尔兰、瑞士——银行体系过于发达，国家很快就不堪重负。

如果想要克服目前的市场失灵，并最终保护纳税人，那么，就需要更强有力、更全面、更有力的金融市场监管，以削弱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让它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信贷）(Kamppeter 2011; Dullien / Herr / Kellermann 2009, 2011)。以下列出了新金融市场监管的关键要素。理想状况下，它们应该在全球统一实现；如果全球层面做不到，至少应该在欧洲层面实现 (Noack / Schackmann-Fallis 2010; Kapoor 2010; Dullien / Herr 2010; Arbeitskreis Europa 2009; Steinbach / Steinberg 2010):

- 建立集中的金融市场监管，并尽量做到统一、有力和跨国界，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和堵住监管漏洞。这个中央监管机制应像各国的监管当局那样有权力颁发指令、规定限制条件。
- 联合监控金融体系的系统稳定性。

- 向所有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提出更高额的反周期资本准备金和流动性要求；禁止无资本覆盖的表外实体，限制银行及金融市场行为体累积新债务（杠杆率），以减少投机性、债务驱动的投资行为，以及提高危机状态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 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必须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制定“生前遗嘱”（清算规则），以免（跨国）机构资不抵债进行清算时危及他人。这样也能增加私人行为体的投机成本。
- 减少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或许还要更严格地把传统贷款业务同投行业务区分开来；对私营评级机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用共同体基金的资金建立一个欧洲评级机构 (Arbeitskreis Europa 2010b)。
-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削弱私营评级机构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作用。
- 减少准市场公允价值会计原则的运用。
- 限制商业银行转售贷款（证券化）。
- 对衍生品交易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使其只能在中央清算所进行清算（减少场外交易）。
- 建立欧洲银行破产法，确保资不抵债的银行能顺利有序地清算。
- 建立一个金融“检查机构” (MOT)，在新金融工具推向市场前为银行和投资者提供准确的社会价值和风险评估。只有对社会有利的新金融工具才可以上市 (Dullien / Herr / Kellermann 2009, 2011)。
- 引入金融交易税 (Paul / Neumann 2011)，对（银行）经理的奖金进行更严格、更长期导向的监管，使得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追求短期利润和投机的行为不再有利可图，从而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

德国银行体系传统的三支柱架构应该得到保留和扶持，因为它在此次危机中起到了稳定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尤其要归功于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然而，州立银行还应该进行整合；新的长期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应当得到发展 (Noack / Schrooten 2009)。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也是执行增长导向型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条件。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增长导向型货币政策就会绝望地陷入仅仅运用利率政策来保障价格稳定和金融市场稳定的泥潭。

然而,若有有效的金融市场监管,就得利用这种监管提供的腾挪空间,并奉行增长导向型货币政策(Winkler 2008; Illing 2011)。

2. 运用教育政策,推动增长力量,为所有人扩展机会

在供应方方面,社会增长取决于良好的首次培训和继续教育。教育和知识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助于增长和繁荣(Prognos 2011a; Blossfeld et al. 2011)。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让人民有改善生活的机会。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和私营部门未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只有政府的教育政策才能提供增长和就业所需的足够的教育投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社会凝聚力就会受到威胁。有关教育水准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德国的教育支出徘徊在经合组织平均水平附近,而且越来越落后于领跑国家。德国提供的终身学习机会也同样不多:如果我们想要延长退休年龄,并且有足够的工人在退休前从事生产性就业,那我们必须扩大终身学习的机会。因此,德国在未来不但应当增加对首次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投资,而且还应当调整教育结构(Borgwardt 2011; Wernstedt/John-Ohnesorg 2010;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2010)。

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涵盖从早教到终身学习的、既社会公正又高绩效的教育体系。为此,单有个别的好学校和大学还不够,我们需要提供覆盖全国城市和乡村的教育和培训。只有广泛的公共教育供给,所有的孩子、年轻人、培训生和学生,无论他们父母收入的高低,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降低教育成就和社会出身之间的强相关性,减少无技能的年轻人的数量,并把高辍学率降下来。为此,以下措施是必要的(Baumert 2010; John-Ohnesorg 2009; Wernstedt 2010):

-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在中小学校、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的职责分工应该重新界定,以便确保未来各项任务有充分的财力支持。
- 各层次的教育必须更加个性化:所谓的高风险学生不是铁板一块。加强语言培训特别重要。
- 因为早期学习和支持会影响到后续的各个学习阶段,所以教育必须更早开始。因此,必须强化早期支持,尤其是向三岁以下儿童提供的早期支持:应该建立更多的"Kitas"(面向双职工家庭的托儿

中心)和幼儿园;这些设施的开放时间和儿童保育期应当调整(也能起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作用),教学法和员工素质必须通过配置受过更好培训的人员加以提高。

- 学校体系必须推迟分流,向学生提供全科教育,并提供横向和纵向拓宽的机会。全国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双轨制学校体系。
- 具备高素质教工,既提供儿童保育、又提供全科学习和下午课程的全日制学校数量必须增加。这些学校的基础设施——房屋、取暖、新媒体、餐厅等——必须更新换代。它们必须融入当地教育网络,以提供个性化支持。
- 为了满足二元制和职业教育体系受训者的需求,培训场所和全日制职业培训学校必须扩建。为了减少不符合将来职业最低培训标准的劳动者数量,必须尽早采取可持续的措施,如强化向来自移民家庭的年轻人提供的支持。
- 为此,教育、研究和科学领域的经费必须进一步增加(目标: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技术的变革意味着,各领域都需要更高素质的员工。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提高其收入的可能性。为此,在岗劳动者和具备低、中、高级技能的失业者都必须在就业和生活的各个阶段接受进一步的、更高级的培训,不仅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高素质劳动者短缺和退休年龄推迟。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还必须聚焦进修和高级培训的目标。失业保险应当发展为就业保险(Schmid 2008)。与休假、请假和接受培训的劳动者返岗等相关的权利应当改善,中小企业通过集体协议建立行业性的培训基金的行动应当得到支持(Bosch 2010)。最后,所有人都有接受培训和个性化支持的权利。

3. 运用产业政策,开辟新增长领域

就像其它任何增长进程一样,社会增长的结构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以结构变化为特征的。为了能够应对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整治和环境更新方面的挑战——气候变化、环境破坏、有限自然资源,我们在未来需要一种环境产业政策,以先期确定并促进一些增长领域,并确保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未被遗忘(Schepelmann 2010)。德国的环境产业是成功产业政策的例证(BMU 2009)。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干预——设定高远的环境目标,并将目标转化为资源消

费的参数和最高值,且将其恒定地外推到各个生产和私人消费领域——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不会崛起 (Fischedick/Bechberger 2009)。国家能够且应该运用立法、其购买力和市场力量,加上其环境、研究、基础设施、税收和经济政策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由此成为重要的技术推动者和创新发动机。在这一框架下,国家应当通过重大经济投资激励机制来促进创新和可持续产品的研发和上市 (Meyer-Stamer 2009)。

在未来,在气候和环境保护领域,国家直接支持计划费用昂贵且成效往往不确定。将来应采取别的形式,如推进尽可能全球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把环境消费完全纳入价格中 (Löschel 2009; Knopf et al. 2011)。全国性的气候保护法律也值得考虑,依据它在一个实施计划中为所有地方当局和各经济部门制定具体指导方针,其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经济行为体的行为,让所有生产结构和价值创造链实现生态化。有了明晰的能效指导方针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还可以进一步刺激公共采购指令框架里的供求和合同配置 (Pfaller/Fink 2011)。

地方层面应在其中得到特别优先权。在社会对话的框架下,先要确定需求,然后制定解决方案,并进行尝试。这样就有可能将消费者、企业、科学家、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紧密地结合和联网。总体上,以此方式,政府在气候保护及资源、能源消费方面的指导方针就能有助于实现全国性的气候目标,增强企业在新兴的绿色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此外,这一对话过程还有助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相互和解。激进的结构变化会引发社会苦难,影响整个社会,所以必须尽快加以应对 (Pfaller/Fink 2011; Bär et al. 2011)。

未来的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部门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现代产业政策来终结支持政策和财务方面对非有形产品的歧视。除了发展更多同增值密集型产业挂钩的服务业,社会增长主要取决于高质量社会服务的增长。同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社会服务方面的就业有着很大的缺口。在所有服务类别中,欧盟15国就业增长最快的服务类别——除商业服务之外——是高质量社会服务和社会导向型服务。尤其在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例如,病人和老年人的护理、社会福利体系和教育体系——大大增加,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增长和就业潜力。

所谓的“鲍默效应”——也称“鲍默成本病”——经常导致自由市场上对社会服务的需求疲软 (Baumol 1967)。因此,私营企业往往不能充分满足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但是,明智的服务政策能够克服这

一市场失效 (Bienzeisler et al. 2011; Schettkat 2010)。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发展低价服务的政策,不要以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削减成本——这是通过刺激低工资部门的增长、加剧工资差异实现的——来拉动潜在需求、进一步扩张社会服务业。发展低价服务的战略最终所创造的只能是报酬低、稳定性差的工作岗位,因而导致服务低、价值创造少。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扩张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实施更为适度的工资差别、提高工资水平、减少社会不平等是有可能同时实现的。不过,高质量社会服务战略要求国家更为积极地扮演社会服务部门的融资者、生产者和/或雇主的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的资金提供机制,如社保体系,不但可以发展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还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服务。在此背景里,北欧模式还表明,即使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也不会是总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阻碍 (Heintze 2011; Schettkat 2011)。

未来的教育、家庭和税收政策必须同社会服务部门里的薪酬合理的体面工作的创造与促进更好地协调。在教育政策方面,必须支持和建立国家认可的教育和职业资质,以确保员工受到更好培训。从业者素质提高了,潜在客户就更能接受社会服务,也更愿意支付报酬。反过来,家庭政策可以增加女性的就业,在社会服务的需求和供应双方创造新就业机会 (Luci 2011)。值得一提的是,训练有素的高素质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后,社会服务的需求和供应都会增加。目前,社会服务通常是由女性在家庭内部提供的。未来的家庭政策应该少强调转移福利,如儿童补助金和育儿津贴,而是应多强调实物福利,如儿童保育服务的扩充 (crèches, 即向三岁以下儿童开放的日托中心)。后者可以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响应,而且尽可能不收费。

4. 通过最低工资和共决机制, 增强雇员地位

社会增长需要能够保障员工参与价值创造并具备高购买力的工资政策。我们必须避免实际工资的滞涨和收入不平等的日渐扩大,不但因为这有悖社会正义,而且因为这会导致国内需求的滞涨,从而造成总体增长率在低位徘徊、外部失衡越来越严重 (Joebges 2010; Joebges et al. 2010)。未来的工资政策必须更加倾向于生产率的提高——名义工资的增长应同长期总生产率增长和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胀率成比例——不但德国要做到,而且欧洲乃至全球都要做到。只有这样,国内需求才能持续走强,欧洲货币联盟内部的失衡风险才会降低 (Busch 2010; Busch/Hirschel 2011; Pusch 2011)。尽管德国的自主集体协商制度限制了政府的工资政策,政府仍然能够影响工资走向:

- 全面的法定最低工资制度是每个工人进行工资谈判的坚实基础,也因而能够防止工薪标准下滑,以及防止低工资变成贫困工资,危及人民维持生计的能力(Bosch et al. 2009a; Bosch et al. 2009b)。最低工资制度迫使企业在高生产率和创新的基础上竞争,而不是靠低工资竞争。如果法定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8.5欧元,它将不但能改善500万人民的收入状况,而且能提高约1450万家庭的收入。它还能德国公共预算减轻约70亿欧元的负担(如向较低收入者提供的支持和更高的税收收入)(Ehrentraut et al. 2011)。
- 政府应当停止推广所谓的迷你工作(mini-job)和迷迪工作(midi-job),重新引入普遍社保义务,以纠正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不可取的发展动向。
- 企业和公司层面的职工共决机制应当拓展。要迫使企业参加雇主协会,或者宣布集体协议有普遍约束力,这样就能加强集体协议的效用。政府能够也必须给工会实质性的帮助,让它们充分利用宏观经济分配边际,并创造良好工作条件(Hörisch 2010; Greifenstein 2011; Greifenstein/Weber 2009, 2008)。
- 此外,政府在将来能够也必须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雇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服务、尤其是一般利益服务有着巨大需求和缺口,而且因为国家有可能在一个重要的劳动力细分市场上为体面、薪酬合理的工作设立标准,从而向其它劳动力细分市场发送重大的积极信号。如果规定只有符合体面工资和体面工作条件最低标准的企业才能赢得公共合同,那也能取得类似的积极效果。

5. 改革税收政策,适当而又公平地为公共任务提供资金

社会增长这一概念的基础是,国家和社区对多个从性质上讲极为艰巨的任务负责。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弥补许多领域的市场失效,从而为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及在财务、环境和社会方面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克服关键政策领域经费不足的困难——如教育领域的资金缺口至少有250亿欧元,以及为了能为未来发展进行必不可少的投资,国家必须有充足的财力。目前,政府预算出现赤字,政府债台高筑。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要增加公共债务来为额外支出筹集资金是不可行的。未来有必要实现可持续的预算整固。

虽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接受严格的审视,但国家面向未来的投资计划和资金问题不能单靠支出削减来实现。同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的公共投资和税

率都已经创下了新低。因此,一个负责的、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预算战略应当优化政府财政收入,扩充资金池。换句话说,应当在某些领域加税。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收入状况尤其需要改善,因为将来它们必须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提供一般利益产品和服务。

因此,在税收政策框架里,社会各阶层以及各收入群体都必须在团结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提供执行这些政策所需的公共收入(Corneo 2010)。除了公正(基本原则:税赋按支付能力来定)考虑之外,加税时还必须考虑到激励效应(环境更新、避免金融危机)。基于分配、公正和稳定化的考虑,在未来,主要是高收入者要承担大部分新增税赋。目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而相比其它国家,德国对资产和资本利得基本不征税。未来,金融资产带来的收入应当征税,而且税率应当更高。以下措施是合理恰当的(Mende et al. 2011):

- 提高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这不会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收入较高者的收入储蓄比例较高。如果把10万或20万欧元应税收入的税率再次提高到49%,政府税收收入一年就能增加约70亿欧元。此外,针对高收入者,还可以考虑对25万或50万欧元应税收入多征收3%的税(富人税),这笔收入专门用来支付教育费用。
- 取消根据“增长加速法”施行的税收优惠:这样政府预算就能多出56亿欧元。
- 改革公司税:一方面,取消最近一次的公司税削减并提高资本利得税,这样政府收入就能增加400亿欧元。另一方面,应采用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于实际资本和研发,尤其是对未来导向型部门和领先市场的投资,如把递减折旧率永久性定为30%。
- 提高营业税:为了改善市、镇、地区的财务状况,必须提高营业税,尤其要把纳税范围扩大到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群体,特别是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员。
- 提高财产税:上述内容同样适用于财产税,其纳税范围也应该现代化。
- 提高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应当再次提高,从目前的25%提高到29%(不含富人税)或32%(含富人税);要么重新推出综合税,取代资本利得税。
- 改革遗产税:通过遗产税改革,让家庭内部的中小规模遗产和馈赠免税,但50亿欧元以下的重大财产转移应当再次适用高税率。

- 重新推出财富税：单单这一举措就能增加160到200亿欧元左右的财政收入，为降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做出重大贡献 (Schatzenstaller 2011)。
- 推出金融交易税：这也能为降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做出重大贡献——还能让那些该为金融危机负责的人分担应对危机的成本——而且能防止危机再次爆发。如果全欧洲都推行金融交易税的话，即使税率较低（如0.05%），也能增加收入约120到200亿欧元 (Paul/Neumann 2011)。
- 废除配偶间的所得税分计，引入个人税 (Färber et al. 2008)。
- 提高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以及排放的税率（生态税）：这可以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也能取得重大的、卓有成效的环境激励效应 (Pfaller 2010a)。
- 坚持打击避税行为和国际避税天堂，堵上税收漏洞。

在未来，上述措施将增加国家的财力，使其开展社会增长所需的活动，并承担社会增长所需的支出，并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公平透明的税收还能中止公民与国家间绵延多年的疏远现象。新增税收收入能提供除社保之外的更多高质量公共社会服务，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

必须保护国家提高税率的能力，使其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欧洲的公司税。为了防止各国竞相降低公司税以获得国家竞争力，保障各国在税收收入、税收结构和对其它税种的影响方面的可把握性，全欧应该达成协议，通过统一的公司税框架立法。这就要求引入一个强制性的、欧盟范围的应税收入评估体系和一个全欧统一的最低税率 (Hull/Risen 2007; Risen/Hull 2011)。

6. 运用反周期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和债务状况

本次危机期间，实施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国家遏制了经济的下行势头，使世界经济以较快速度回归增长轨道。长期以来，经济刺激政策不被看好，因为它们被视为效力低下、抬高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和负债率，让后代背上更沉重的债务包袱。事实上，在过去，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效果相当好。德国如此，其它经济体更是如此。一个成功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一定要给后人留下永久的债务，条件是每次经济下行后再繁盛时出现的预算盈余都用于偿债和减债。反周期政策

不但能够稳定短期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强化长期增长，因为对经济波动十分敏感的企业支出，如研发投入，不会在危机中暂停，而是继续投入于资本和专门知识，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后续潜力。如果经济上行期能够尽可能拉长，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群和长期失业人群就能实现“正常”就业。

德国的长期经验和欧元区最近发生的事件明确说明，危机中的强制紧缩政策无法降低公共债务，只有危机过后的长期持续发展才能做到。危机期间通过削减支出和提高财政收入来减少赤字的做法实现不了公开宣布的目的，反倒拉长了经济下行期，结果事与愿违。如果没有恰当的宏观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改革也会抑制消费，从而抑制增长。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也需要反周期政策来配合，以尽量拉长经济上行期 (Dauderstädt 2007; Lenz 2011; Heise/Leers 2011)。

因此，任何旨在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箱里都应该有反周期政策这一工具。反周期政策不应当仅仅是自由裁量的：经济体系——如税收和社保体系——中应该嵌入自动稳定机制；反周期政策也不应当受到削弱，如经济上行期减少社保缴费，结果到了经济下行期又得补交。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的债务刹车大大可疑。在顺周期预算政策框架下，债务刹车会妨碍未来的重大投资。

预算政策不应应对公共赤字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公共赤字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私营企业和家庭互动的结果，还受到其它国家的影响。因此，从增长和稳定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追求长期支出路径比追求控制赤字目标要好。如果有一条长期支出路径，那么我们就能够容忍收入和支出的周期性波动，可以发挥公共收入和支出的稳定性作用，而政策只需刺激符合长期增长趋势的国家支出即可。相应地，我们还可以规划充足的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追求这一路径带来的总体平衡，不能是我们偏离这一路径的一个原因，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偏离。财政政策以长期支出路径为导向，不但能够防止顺周期影响、稳定经济局势和较长期发展道路，而且能够稳定政府的负债比例。正因为如此，政府财政或公共债务必须是可持续的，不应该追求绝对减债 (Vesper 2008, 2011; von der Vring 2010; Fischer et al. 2010)。

7. 建立稳健的公共金融架构，增强欧洲的增长力

本次危机表明，欧元区国家融资存在独特问题，而且成员国经济体的资本供应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各国必须有能力借款，这样才能为公共投资和反

周期财政政策提供资金。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各国在欧洲资本市场上形成了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们还是各自国内银行体系的保证人。这一局势在本次危机中成了一个严重障碍,是政府债务激增的主要原因。尽管更好的银行监管(见第五章第1节)可以降低这类风险,但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和更多的流动性。

欧洲的可持续社会增长必须在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不受非理性市场潮流影响的信贷供应。为此,我们需要一些泛欧机制来确保各国的流动性和银行的流动性——至少要保证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的流动性。这些机制必须拥有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可用资本资源,还必须具备监督和调控能力。归根结底,原则上可以创造无限货币和信用的欧洲中央银行必须成为整个体系的保证人。为此,现有的法令可能需要修改,以废除在危机中已经被突破的某些限制条件(如购买政府债券等)——这些限制条件是建立在一个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货币政策理念基础之上的。如果能向市场发送明确信号,告诉后者,任何针对重要的欧元区机制的投机行为必须考虑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抵制,那么此类市场行为导致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Dauderstädt 2011d and 2011e; Schreyer 2011)。

欧洲资本供应机制的第二个重要保护措施是所有成员国的连带保证。这一连带保证首先应当在欧元区内部实现。欧洲货币基金可以成为一个关键工具。它可以发行共同体债券(欧元债券),由欧元区成员国提供共同担保,以统一的并因此低的利率发行。但是,为了规避道德风险,应将欧元债券的负债上限设定在最多不超过一国内生产总值的60%(蓝色债券)。超出该上限的借款——红色债券——将完全由相关国家独立负责。如果该国财政纪律和信誉不佳,那发债成本将相当昂贵。蓝色和红色债券的基本理念是,欧洲各成员国应当相互团结,但各国仍需承担相应责任(Delpla/von Weizsäcker 2011; Deubner 2010)。

欧洲的信贷分配应给予较贫穷地区优先权。因为这些地方的资本存量必须增加——而且通常会取得更高的边际生产率——所以投资于外围地区会有更高的经济价值。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引导深受危机之苦的国家回归增长道路。危机基金在这里可以发挥作用,为实际资本、创新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提供资金。危机基金的来源可以是欧元区国家专门征收的团结税或财富税(Hacker 2011a)。此类税种合乎情理,因为过往经验表明,危机中的国家干预能保护资产价值,令其不至于快速贬值——而且将来只有经济增长,资产才能长期保值。这个欧洲投资基金应当同

欧盟调整后的增长战略密切相连。里斯本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已经将成员国引向逐底竞争。该战略应该由一个注重提高生活质量的经济强劲、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的政策组合来取代(Arbeitskreis Europa 2010a; Collignon 2008; Kellermann et al. 2009)。

然而,为了长远地减少竞争压力,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纠正性措施。如果纠正当前局势还不够,那么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维护国家主权”并接受宪法现实的理念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欧洲政策来取而代之。因此,为长远计,欧盟必须有能力征税、动用共同体预算资源,经由扩张后的或新创立的区域基金、结构基金和其它基金,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劳动条件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意义深远的、旨在抚平区域性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建议,如开放成员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或建立欧洲失业保险,要求欧盟内部创造团结文化。在将来,这一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防止某些成员国从一体化进程中大获好处,而另一些成员国则被落在后面。可能的工具包括欧洲团结税、欧洲财政转移和财政联盟。其目的不在于协调经济和生产结构,而在于符合各国特定环境的社会增长政策。个别欧盟成员国不会解体,也不会完全丧失比较国民经济竞争优势。在未来更为稳健的联邦框架下,也即当欧洲各国的联盟发展成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国家时,生活水准的平等必须是一个长期目标。

8. 协调经济政策,为欧元区提供更多稳定性

欧洲最重要的危机问题如果要得到持久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减少目前的经常账户失衡(Münchau 2010; Spahn 2010)。仅靠逆差国家实行预算整固或工资限制以提高竞争力、积累预算盈余和出口顺差的战略不会成功,因为这样做会抑制总体需求,进一步加重深受危机之苦的国家的债务负担。反过来,一直施行这一战略的国家须在很大程度上为欧元区爆发的危机负责(Dullien 2010b)。为了应对目前的危机,规避宏观经济失衡,鼓励德国和欧洲的社会增长,未来的私人 and 公共债务增长以及导致此类增长的宏观经济错误必须尽早加以控制或纠正。为此,必须采取步骤,将政治一体化进行得更深入,尤其需要国民经济、财政、工资、税收和社会政策方面更强有力的欧洲协调和控制(包括建立统一的框架指导方针和最低社会标准)。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单方面偏向公共债务标准的做法(Hacker/van Treeck 2010; Arbeitskreis Europa 2010b; Heise/Heise 2010; Hacker 2011b)。

为此，“稳定与增长公约”必须进一步发展为“经常账户稳定公约”——换句话说，它必须得到拓展，涵盖经常账户平衡目标和各国家庭及企业的债务情况。如果哪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自动制裁就开始生效，必要的调整措施应当遵循对称原则：也就是说，顺差和逆差国家都有义务减少经常账户失衡 (Dullien 2010b)。

除了财政和税收政策，工资和社会政策也是纠正欧洲的宏观经济失衡所需的任何政策组合中的重要元素 (Fischer et al. 2010; Joebges 2010)。为了提高工人的购买力，从而为欧洲的社会增长做出贡献，未来各成员国的名义工资增长必须更紧密地同长期总生产率和央行通胀率的增长挂钩，这样才能避免竞争领域的价格扭曲。因此，在某些国家——经常账户逆差国家——单位劳动成本有必要下调；而在另一些国家（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单位劳动成本有必要上调。工资政策应当更紧密地同这一目标挂钩，各国现有的工资谈判网络应当拓展为跨国工资谈判网络 (Pusch 2011; Busch 2010)。为此，工会和雇主组织更大程度的、在制度和组织方面的欧洲化必不可少 (Platzer 2010; Busemeyer et al. 2007)。

作为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社会伙伴的联合机制，宏观经济对话 (MED) 可以恢复，以加强不同工资政策之间的协调。必须记住，在由“市场国家”组成的欧洲体系里 (Busch 2009)，以价格竞争为名展开工资、税收和社保缴费方面的逐底竞争无法成就可持续的增长和繁荣。这样的竞争不会提高生活质量，只会强化收入和财富从底层向顶层的再分配，从而加剧通缩风险 (Arbeitskreis Europa 2010a; Evans/Coats 2011)。

9. 建立欧洲和全球标准，保证所有人的体面劳动

社会增长意味着“所有人都从事体面工作”。不但德国，而且整个欧洲，还有全世界，都应该追求和实施这一目标。在欧洲层面，蓄意创立的市场国家体系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Busch/Hirschel 2011)。目前，欧盟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国自行其是，以至于各成员国间展开对资本投资、生产地点和工作的相互竞争。低工资、低社会标准、低社保缴费和税收减让成为竞争优势，完全违背了“所有人都从事体面工作”这一原则。在将来，我们不应该把税收、社保缴费和工资水平等作为谈判筹码，而是引入一些新机制，让社会凝聚力成为欧洲协调努力的中心 (Hacker/van Treeck 2010)。

为了调节欧洲内部在投资、就业和生产地点方面展开的竞争，“社会稳定公约”必须取代竞争驱动的统一化。这个公约将界定一个走廊，防止工资和社会福利偏离普遍收入增长。例如，这个走廊模式可以依照经济表现规定最低工资——用国民平均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来表达——以防止工资差异加大和低工资部门的扩张。所有欧盟国家的最低工资至少必须保障最低生活水准 (Zitzler 2006)。

各成员国的社会支出应当跟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挂钩，还应当规定针对老年人、医疗保健、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失业人员等的总支出随经济发展的浮动范围。这样一个协调机制将确保目前欧盟内部经济和社会进步之间仍然紧密的关系得以维持，同时又能阻止各国之间的低价竞争。所有成员国均应既追求高生产率，又追求高社会支出比率 (Busch 2011)。教育支出也应融入这样一个走廊模型或社会稳定公约。同“经常账户稳定公约”一样，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各国分别协调和执行的政策同欧洲中央指导原则之间的明智平衡。在欧洲2020战略框架下重新设计“开放协调法”能够实现这一平衡 (Hacker 2009; Arbeitskreis Europa 2010b)。

“所有人都从事体面工作”也是全球层面社会增长的一个关键条件。为此，必须设立国际标准，帮助欠发达国家的人民迅速提高收入水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遏制社会财富再分配方面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推动全球就业向体面工作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体系必须扩展 (Razavi 2011)。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基本社保体系。未来我们必须更重视此类体系的进一步扩展以及对国际劳动组织“社会保护底线”等相关倡议的支持 (Cichon et al. 2011)。

10. 建立经济和货币新秩序，管理全球化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欧洲层面和全球层面都需要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金融危机期间已经出现了此类合作的苗头。这些苗头的形式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无疑是成功的。例如，最重要的国家同意并同时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受国际社会监控的放弃保护主义措施的安排。危机期间各家中央银行在扩张性/宽松货币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合作也相当成功。尽管所有这些措施仍无法阻止2009年的剧烈增长减速，全球经济复苏还是相对较快的。因此，整体而言，国家的危机管理令人鼓舞。

此类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不应只局限于危机管理阶段。将来宏观经济合作及联合行动必须持续。理想状况下,为了防止新的危机并确保全球层面的社会增长,应当建立一个结构和制度锚点。只有通过外部经济保障措施——也即在全球层面找到应对全球问题的联合解决方案——德国的国家社会增长战略才能成功。各国应将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充分增长——也即基本不受阶段性或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作为共同目标。

全球失衡是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重大肇因,因此必须加以解决。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让顺差和逆差国家都进行经常账户的对称调整 (Priewe 2011)。只有这样,大规模的结构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通缩趋势才会得到遏制。经常账户对称调整的同时,所有国家之间的协调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监控必须得到改善。此类改革的结果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做出承诺,不但要维持好国内经济秩序,而且要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为此,必须设计制定重大考验预警系统(如公共债务、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金融体系稳定性等)。如果某个国家未能履行承诺或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必须对其进行制裁。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全球储备货币应该从纯粹的国家货币——美元——向真正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资产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特别提款权(SDR)应该扮演关键角色。特别提款权这样一个不同任何国家的经济挂钩的货币和支付工具可以锚定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依照明确的规定来分配和发行。特别提款权的供应必须充沛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及时根据流动性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这样的调整可以不受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主权利益和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为此,增加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中所占的比例是关键的第一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承担着更重大的任务。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加。然而,目前却还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确保各国的重大经济和金融政策决策相互统一,共同实现全球稳定。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也应该承担这样一个重大任务。这样的制度锚点应该比目前的临时安排(G7/8, G20)好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朝国际中央银行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成为全球最后贷款人,把特别提款权变成它自己的货币,把它当作全球储备货币来发行并进行反周期管理。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可能提供无限的——有条件和无条件的——流动性援助,这就提供了全球层面应对危机所需的(更有利的)集体保障。这尤其能防止发展中国家

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可能的国际收支危机的影响而积累外汇储备和其它形式的流动性 (Kellermann 2009)。

因此,在将来我们应当给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运转更多的政治注意力。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意识到,各国必须进行更全面和更高质量的合作。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家利益有新的——开明的——理解。所以,未来全球经济政策合作必不可少。

六、结束语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辩论的决定性转向。过去30多年里,这一辩论一直由市场自由模式主导。而现在,听任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放松监管、私有化和自由化三管齐下——就能为所有人创造繁荣的诺言看来实现不了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涓滴效应”只让少数人尝到甜头。几乎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了,个别特权经济精英面对的是众多全球化进程的输家。“看不见的手”的显败使闯出新路成为可能。这条新路用强化后的政策行动和治理能力取代曾被吹捧为唯一道路的经济自由主义市场机制。

事实上,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政治就超越市场,恢复了首要地位。国家在必要时出手干预,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救助了摇摇欲坠的银行机构,支持了劳动力市场。然而,相应增长的公共债务又引发了新的危机。于是,在危机的第二个阶段,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言人着重实施他们先前的议程。他们暗示,考虑到实际限制,别无他法。在危机即将度过之际,顺周期财政政策、预算整固、紧缩和削减福利国家待遇等主张在政治辩论中受到的支持胜过危机前。与此同时,同更紧密的国际经济政策合作和协调一样,对金融市场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句口号。

如果各政治行为体不采纳上文述及的社会增长的关键要素——如果错失了重新塑造经济信念的机会——结果会是怎样?全球危机向我们揭示了继续追随基要主义发展道路的高昂成本:增长崩溃、经济滞胀、多个国家失业率持续走高、信贷紧缩、高额债务、政治无能、日渐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分化。挥之不去的危机状况和危机的严重后果导致人们、甚至一些中右市场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对过去30多年所信奉的根本性假设——即提高个人对市场的依赖、国家收缩规制权——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取代市场基要主义模式的时机迅速流逝。但我们还有机会用一种新的、进步的经济政策模式来改变目前的辩论。这一机会不应错失!



参考书目

- Arbeitskreis Europa** (2009): *Finanzmärkte zivilisieren! 12 Vorschläge zur Regul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marktarchitektu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0a): *Weichenstellung für eine nachhaltige europäische Wohlstandsstrategi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0b): *Die Zukunft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Artus, Patrick** (2010):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ein Problem für Europa?*,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2010): *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10: Ein indikatorengestützter Bericht mit einer Analyse zu Perspektiven des Bildungswesens im demografischen Wandel*, Bielefeld.
- Bär, Holger / Jacob, Klaus / Schlegelmilch, Klaus / Meyer, Eike** (2011): *Wege zum Abbau ökologisch schädlicher Subventionen*,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artsch, Klaus / Leithäuser, Gerhard / Temps, Claudia** (2009a): *Szenarioanalyse zur Zukunft des sozialen Deutschland*,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09b): *Zukunft 2020 – ein Modell für ein soziales Deutschland*,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aumert, Jürgen** (2010): *Deutsch ist der Schlüssel*, in: *Die Zeit*, No. 17, 20 April 2011, p. 63.
- Baumol, William**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3): 415–426.
- Bienzeisler, Bernd / Ganz, Walter / Hilbert, Josef / Kluska, Denise** (2011): *Dienstleistungen in der Zukunftsverantwortung – Ein Plädoyer für eine (neue) Dienstleistungspolitik*,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lossfeld, Hans-Peter / Bos, Wilfried / Daniel, Hans-Dieter / Hannover, Bettina / Lenzen, Dieter / Prenzel, Manfred / Wößmann, Ludger** (2011): *Bildungsreform 2000–2010–2020: Jahresgutachten 2011*, Aktionsrat Bildung; available at: http://www.vbw-bayern.de/agv/vbw-Themen-Bildung-Bildung_ganzheitlich_gestalten-Publikationen-Jahresgutachten_des_Aktionsrats_Bildung_Bildungsreform_200020102020--14852,ArticleID__18104.htm (accessed on 31 October 2011).
- Bontrup, Heinz-J.** (2010): *Durch Umverteilung von unten nach oben in die Kris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orgwardt, Angela** (2011): *Bologna 2010/2011: Hochschulen im Umbruch – Eine Zwischenbilanz*, Publikation zur Konferenz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vom 12. November 2010, Hochschulpolitik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erie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tudies Support unit, Bonn.
- Bormann, René / Dauderstädt, Michael / Fischer, Michael / Schreyer, Markus** (2009a): *Deutschland 2020 – Aus der Krise in eine soziale Zukunft*,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09b): *Wohlstand durch Produktivität –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osch, Gerhard** (2010): *In Qualifizierung investieren – ein Weiterbildungsfonds für Deutschland*,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osch, Gerhard / Kalina, Thorsten / Weinkopf, Claudia** (2009a): *Mindestlöhne in Deutschland*,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09b): *Warum Deutschland einen gesetzlichen Mindestlohn braucht*,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Busch, Klaus** (2009): *Weltwirtschaftskrise und Wohlfahrtsstaat: Lösungskonzepte zum Abbau ökonomischer und sozialer Ungleichgewichte in der Weltwirtschaft*, in Europa und in Deutschland,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0):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regierung und Koordinierung der Lohnpolitik: Krise der Eurozone verlagert Struktur-reformen*,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1): *Das Korridormodell relaunched. Ein Konzept zur Koordinierung wohlfahrtsstaatlicher Politiken in der EU*,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Busch, Klaus / Hirschel, Dierk** (2011): *Europa am Scheideweg: Wege aus der Krise*,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Busemeyer, Marius R. / Kellermann, Christian / Petring, Alexander / Stuchlik, Andrej** (2007): *Overstretching Solidarity? Trade Union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l*,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Cichon, Michael / Behrendt, Christina / Wodsak, Veronika** (2011): *The UN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Initiative: Turning the Tide at the ILO Conference 2011*, Friedrich-Ebert-Stiftung,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erlin.
- Collignon, Stefan** (2008): *Vorwärts mit Europa: für eine demokratische und progressive Reform der Lissabon-Strategie*,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0): *Demokratische Anforderungen an ein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regier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Corneo, Giacomo** (2010): *Welche Steuerpolitik gehört zum »sozialdemokratischen Modell«?*,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auderstädt, Michael** (2007): Increasing Europe's Prosperi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issue 1, 28–46.
- (2009a): *Kohäsion mit Defiziten – Das europäische Wachstumsmodell in der Kris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09b): *Krisenzeiten: Was Schulden vermögen und was Vermögen schulde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0a): *Die offenen Grenzen des Wachstums*,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0b): *Staatsschulden und Schuldenstaaten: Europa braucht ein neues Wachstumsmodell*,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0c): *Europas unterschätzte Ungleichheit*,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0d): *Soziales Wachstum gegen die Schuldenkris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a): *Der Fortschritt ist bezahlbar*,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b): *Globales Wachstum zwischen Klima, Gleichheit und Demographi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c): *Globale Ungleichheit: 50:1 für die Reiche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d): *Staatsgläubigerpanik ist keine Eurokris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e): *Ein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regierung muss Wachstum durch Schulden steuer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auderstädt, Michael / Hillebrand, Ernst** (2009): *Exporteuropameister Deutschland und die Kris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elpla, Jacques / von Weizsäcker, Jakob** (2011): *Eurobonds. Das Blue Bond-Konzept und seine Implikation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Deubner, Christian** (2010): *Staatsverschuldung zügeln mit Hilfe der Märkte: Instrumente und Verfahre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ullien, Sebastian** (2010a): *Finanzkrise kostet jeden Deutschen im Schnitt mehr als 9.000 Euro*,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0b): *Ungleichgewichte im Euroraum: akuter Handlungsbedarf auch für Deutschland*,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ullien, Sebastian / Herr, Hansjörg** (2010): *Die EU Finanzmarktreform: Stand und Perspektiven im Frühjahr 2010*,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Dullien, Sebastian / von Hardenberg, Christiane** (2011): *Der Staat bezahlt die Krisenzech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Dullien, Sebastian / Herr, Hansjörg / Kellermann, Christian** (2009): *Der gute Kapitalismus... und was sich dafür nach der Krise ändern müsste*, Bielefeld (transcript-Verlag).
- (2011): *Decent Capitalism: A Blueprint for Reforming our Economies*, translated by James Patterson, London (Pluto Press).
- Ehrentraut, Oliver / Matuschke, Markus / Schüssler, Reinhard / Schmutz, Sabrina** (2011): *Fiskalische Effekte eines gesetzlichen Mindestlohns*,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Evans, John / Coats, David** (2011): Exiting from the Crisis: Towards a Model for More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issue 2, 22–31.
- Färber, Christine / Spangenberg, Ulrike / Stiegler, Barbara** (2008): *Umsteuern – Gute Gründe für ein Ende des Ehegattensplittings*,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Fischedick, Manfred / Bechberger, Mischa** (2009): Die ökologische Industriepolitik Deutschlands am Beispiel der Solar- und Windindustrie – Musterschüler oder Problemkind?, in: *Moderne Industriepolitik*, issue 2, Stabsabteil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 Fischer, Severin / Gran, Stefan / Hacker, Björn / Jakobi, Anja P. / Petzold, Sebastian / Pusch, Toralf / Steinberg, Philipp** (2010): *»EU 2020« – Impulse für die Post-Lissabonstrategie, Progressive Politikvorschläge zur wirtschaftlichen, sozialen und ökologischen Erneuerung Europas*, Friedrich-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Greifenstein, Ralph** (2011): *Perspektiven der Unternehmensmitbestimmung in Deutschland – Ungerechtfertigter Stillstand auf der politischen Baustell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Greifenstein, Ralph / Weber, Helmut** (2008): *Arbeitnehmerbeteiligung im Mittelstand zwischen Patriarchat und Mitbestimmung*,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09): *Zukunftsfeste betriebliche Mitbestimmung –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Wirtschaft, Gewerkschaften und Politik*,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Hacker, Björn** (2009): *Vers un »Maastricht social«: propositions pour un pacte de stabilité sociale europé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Paris.
- (2011a): *MS Europa steuern oder Schiffchen versenken? Der deutsche Krisenkurs birgt ökonomischen und politischen Sprengstoff für die EU*,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1b): *Konturen einer politischen Union: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durch mehr Integration neu justier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Hacker, Björn/van Treeck, Till (2010): *Wie einflussreich wird die europäische Governance? Reformierter Stabilitäts- und Wachstumspakt. Europa-2020-Strategie und »Europäisches Semest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Heintze, Cornelia (2011): *In jeder Krise liegen Chancen: Sparpolitik contra Politik des binnenökonomisch aktiven Staates*, presentation by Dr Cornelia Heintze, 7 September 2010,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ES-Ver.di event »Krise als Chance – wird sie genutzt? Potentiale von Konjunktur- und Sparprogrammen für Gemeinwohl und Geschlechtergerechtigke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orum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Heise, Arne/Lierse, Hanna (2011):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und das Europäische Sozialmodell, Auswirkungen der europäischen Sparprogramme auf die Sozialsystem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Heise, Arne/Heise, Özlem Görmes (2010): *Auf dem Weg zu ein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egier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Höpner, Martin/Schäfer, Armin (2010): *Grenzen der Integration – wie die Intensivierung der Wirtschaftsintegration zur Gefahr für die politische Integration wird*, in: *Integration*,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Politik, issue 1, 3–20.

Hörisch, Felix (2010): *Mehr Demokratie wagen – auch in der Wirtschaft.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Unternehmensmitbestimmung in Zeiten der Finanz- und Wirtschaftskris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Illing, Gerhard (2011): *Zentralbanken im Griff der Finanzmärkte – Umfassende Regulierung als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effiziente Geldpolitik*,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Jobeges, Heike (2010): *Exporte um jeden Preis? Zur Diskussion um das deutsche Wachstumsmodell*,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Jobeges, Heike/Logeay, Camille/Stephan, Sabine/Zwiener, Rudolf (2010): *Deutschlands Exportüberschüsse gehen zu Lasten der Beschäftigten*,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Joerißen, Britta/Steinhilber, Jochen (2008): *Die Fantastischen Vier und die Großen Sieben*,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ssue 5, 15–19.

John-Ohnesorg, Marei (2009). *Lehren. Lernen. Neugier weck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Netzwerk Bildung, Berlin.

Kampeter, Werner (2011): *Internationale Finanzkrisen im Vergleich*,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Kapoor, Sony (2010): *The Financial Crisis – Causes and Cure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EU Office Brussels.

Kellermann, Christian (2009): *Der IWF als Hüter des Weltgelds? Zum chinesischen Vorschlag einer globalen Währ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Kellermann, Christian/Ecke, Matthias/Petzold, Sebastian (2009): *Eine neue Wachstumsstrategie für Europa nach 2010*,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Kellermann, Christian/Kammer, Andreas (2009): *Stillstand in der europäischen Steuerpolitik: welche Wege aus dem Wettbewerb und die niedrigsten Steuer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Knopf, Brigitte/Kondziella, Hendrik/Pahle, Michael/Götz, Mario/Bruckner, Thomas/Edenhofer, Ottmar (2011): *Der Einstieg in den Ausstieg: energiepolitische Szenarien für einen Atomausstieg in Deutschland (Langfassung)*,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Lenz, Rainer (2011): *Die Krise in der Eurozone: Finanzmanagement ohne Finanzpolitik*,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Löschel, Andreas (2009): *Die Zukunft der Kohle in der Stromerzeugung in Deutschland: Eine umweltökonomische Betrachtung der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 Stabsabteil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Luci, Angela Stefanie (2011): *Frauen auf dem Arbeitsmarkt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Warum es Französischen besser gelingt, Familie und Beruf zu vereinbar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McKinsey (2011): *Mapping Global Capital Markets 201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ende, Dirk-Ulrich/Corneo, Giacomo/Matthias, Ulrich/Rudolph, Thorsten/Scholz, Heiger/Wilke, Petra (2011): *Zukunft der Staatsfinanzen: Perspektiven für einen demokratischen Sozialstaat*, working paper by the future workshop »Öffentliche Finanz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Landesbüro Niedersachsen, Hannover.

Meyer-Stamer, Jörg (2009): *Moderne Industriepolitik oder postmoderne Industriepolitik?*, Stabsabteil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Miegel, Meinhard (2010): *Exit: Wohlstand ohne Wachstum*, Berlin: Propyläen.

Ministerium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 (BMU) (2009): *Umweltwirtschaftsbericht 2009 – Umweltschutz als Wirtschaftsfaktor*, Berlin.

Münchau, Wolfgang (2010): *Letzter Ausweg gemeinsame Anpassung – die Eurozone zwischen Depression und Spaltung*,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Netzer, Nina (2011): *Ein weltweiter Green New Deal: Krisenmanagement oder nachhaltiger Paradigmenwechsel?* Friedrich-Ebert-Stiftung,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erlin.

Noack, Harald/Schackmann-Fallis, Karl-Peter (2010): *Lehren aus der Finanzmarktkrise ziehen*, Managerkreis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Noack, Harald/Schrooten, Mechthild (2009): *Die Zukunft der Landesbanken – Zwischen Konsolidierung und neuem Geschäftsmodell*,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Passadakakis, Alexis/Schmelzer, Matthias** (2011): *Postwachstum: Krise, ökologische Grenzen und soziale Rechte*, Hamburg: VSA.
- Paul, Stephan/Neumann, Sascha** (2011): *Finanzmarktregulierung: Einführung einer Bankenabgabe und Finanztransaktionssteuer auf deutscher und europäischer Ebene*, Managerkreis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 Pfaller, Alfred** (2010a): *Ökosteuern in Europa: die politökonomischen Parameter der Umweltsteuerdebatte in Europa*,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10b): *Wieder Wohlstand für alle – Politik für eine integrierte Arbeitsgesellschaft*,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Pfaller, Alfred/Fink, Philipp** (2011): *Standortpolitik für soziale Demokratie: Eckpunkte einer Agenda für Deutschland*,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Platzer, Hans-Wolfgang** (2010): *Europäisierung der Gewerkschaft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2009): *Konstitutioneller Minimalismus: die EU-Sozialpolitik in den Vertragsreformen von Nizza bis Lissabon*, in: *integration*,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Politik, issue 1: 33–49.
- Pohlmann, Christoph/Reichert, Stephan/Schillinger, Hubert** (2010): *Die G-20: auf dem Weg zu einer »Weltwirtschaftsregier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 Prieue, Jan** (2011): *Die Weltwirtschaft im Ungleichgewicht – Ursachen, Gefahren, Korrekturen*,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Prieue, Jan/Rietzler, Katja** (2010): *Deutschlands nachlassende Investitionsdynamik 1991–2010 – Ansatzpunkte für ein neues Wachstumsmodell*,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Prognos** (2011a): *Soziale Prävention – Bilanzierung der sozialen Folgekost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Gutachten, commissioned by the State Chancellery of the Land of North Rhine-Westphalia, Basel.
- (2011b): *Soziales Wachstum durch produktive Kreisläuf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forthcoming).
- Pusch, Toralf** (2011): *Lohnpolitische Koordinierung in der Eurozone: Ein belastbares Konzept für mehr makroökonomische Stabilitä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Razavi, Shahra** (2011): *Engendering Socia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Challenges for Making Socia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Gender Equitabl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Berlin.
- Rixen, Thomas/Uhl Susanne** (2011): *Unternehmensbesteuerung europäisch harmonisieren! Was zur Eindämmung des Steuerwettbewerbs in der EU nötig is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RWI** (2011): *Interdependenz zwischen Entwicklung des Gesundheitsmarktes und der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 und Beschäftigung*,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forthcoming).
- Schepelmann, Philipp** (2010): *Mit der Ökologischen Industriepolitik zum ökologischen Strukturwandel*,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chettkat, Ronald** (2010): *Dienstleistungen zwischen Kostenkrankheit und Marketization*,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2011): *Des Wachstums verschlungene Wurzeln: Produktivität und Beschäftigung*,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chmid, Günther** (2008): *Von der Arbeitslosen- zur Beschäftigungsversicherung – Wege zu einer neuen Balance individueller Verantwortung und Solidarität durch eine lebenslauforientierte Arbeitsmarktpolitik*,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pangenberg, Joachim H./Lorek, Sylvia** (2003): *Lebensqualität, Konsum und Umwelt: Intelligente Lösungen statt unnötiger Gegensätz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chratzenstaller, Margit** (2011): *Vermögensbesteuerung – Chancen, Risiken und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chreyer, Markus** (2011): *Endspiel um den Euro – Notwendige wirtschaftspolitische Maßnahmen zur Überwindung der Vertrauenskrise in der Euro-Zon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eidl, Irmi/Zahrnt, Angelika** (2010): *Postwachstumsgesellschaft: Neue Konzepte für die Zukunft*, Marburg (Metropolis).
- Spahn, Heinz-Peter** (2010): *Die Schuldenkrise der Europäischen Währungsunio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teinbach, Armin/Steinberg, Philipp** (2010): *Nach der Krise ist vor der Krise: Haben wir die richtigen Lehren gezogen, und was bleibt zu tun?*,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Steinhilber, Jochen** (2008): *Kompass 2020: Deutschland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 Uhl, Susanne/Rixen, Thomas** (2007): *Unternehmensbesteuerung europäisch gestalten – mitgliedstaatliche Handlungsspielräume gewinne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 Vesper, Dieter** (2008): *Defizitziel versus Ausgabenpfad – Plädoyer für eine berechenbare Haushaltspolitik*,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 van Ark, Bart/Jäger, Kirsten/Manole, Vlad/Metz, Andreas** (2009):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 Germany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von der Vring, Thomas (2010): *Wirtschaftspolitische Konsequenzen aus der Krise*, WISO Diskur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Wernstedt, Rolf/John-Ohnesorg, Marei (2010): *Bevölkerung, Bildung, Arbeitsmarkt. Vom Bildungsbericht zur Bildungssteuerung*, Netzwerk Bildung series,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Wieland, Joachim/Dohmen, Dieter (2011): *Bildungsföderalismus und Bildungsfinanzierung*, Unpublished study, Netzwerk Bildun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rlin.

Winkler, Adalbert (2008): *Geld- oder Finanzsektorpolitik: Wer trägt die Hauptschuld an der Finanzkrise?*, WISO Direk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uni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Zitzler, Jana (2006): *Plädoyer für eine europäische Mindestlohnpolitik*,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Berlin.



Imprint

The Chinese version is published by FES Shanghai; the original version »Social Growth – Model of a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is published by FES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 An Plaza East Tower | 829 Yan An Zhong Road
Shanghai 200040 | China
www.fes-china.org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Hiroshimastraße 28 | 10785 Berlin | Germany

Responsible:
Dr. Gero Maaß, Head,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Tel.: ++49-30-269-35-7745 | Fax: ++49-30-269-35-9248
www.fes.de/ipa

To order publications:
info.ipa@fes.de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or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which the author works.

This publication is printed on paper from sustainable forestry.



ISBN 978-3-86498-465-5